

作家最好永远处于生长中

□马笑泉

努力维持和增进生命的流动性,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此乃不断创造的根本保证。反过来说,生命的固化状态,乃是创造的死敌,应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去击破。

作家最好不要成熟,永远处于生长性中。成熟的是一部又一部作品。当一部作品以成熟的形态呈现后,他要毅然投入新的不成熟中,并以此为起点,开启另一次尽可能成熟的完成。他在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他的生命始终处于流动、激荡和喷涌的状态。他其实不是拒绝成熟,而是拒绝单一的成熟和成熟的固化。

勿心心念念于代表作,尽力写好手头的每一部作品。代表作晚些出现是件好事,这意味着更多的作品会被关注,而非早就被所谓代表作给遮蔽了。马尔克斯常以淡漠的口吻谈论《百年孤独》,并非真的认为它不够好,而是恼火人们过于关注它,以至于忽略了他后来的一系列优秀之作。当然,《霍乱时期的爱情》不在被忽略之列。实际上,它与《百年孤独》被并列为老马的两大代表作。而勿心心念念于代表作,就有可能写出两本代表作。最好的情形是有多部作品无法被代表,每一部都是光芒四射的存在。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实乃最大的成功。

警惕对风格的强调和固守。需要强调和固守的风格已不是风格,而是套路。真正的风格是作家以其禀赋、修养、技艺与素材激烈搏斗并最终驯服它所产生的。修养可以不断加深,技艺可以不断锤炼,禀赋也会因此而得到扩充和改变,素材也各不相同,所以风格处于一个动态呈现的过程,绝非凝固不变的。由此可以说:风格既是可求的,又非刻意所能求,而最持久、最耐用的风格宛若自然散发,甚至具有生物性。

精神难道不是无法从身体中单独抽离出来吗?器官也是如此。只有二流的小说家才强分肉体和精神。一流的小说家皆是用身体在书写。有力的思想,鲜活的文化,亦皆是从身体中生长出来的。一旦脱离身体,便会成为僵硬的、失血的观念甚至教条。而身体永远是指个体的身体,是无法被替代的“这一个”的身体。

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家只求对得起自己和手中的素材。每一部都忠实于表达的冲动,每一部都努力呈现出它最应该呈现的形态。至于定型之后被贴上什么标签,不关小说家的事。小说家也千万不要主动去认领。小说家一定要摆脱任何流派、任何主义、任何风格的束缚,始能自由驰骋,健旺生长。

成熟的小说家都具备苦练而得的功力,体现于语言、结构、细节提炼、人物刻画、氛围营造等诸方面。但功力“上身”之后,有的小说家发展出了一些固定的描写程式,形成套路,便不足观。当然,这类小说家会拥有稳定的读者群。这类读者的鉴赏能力足以领略套路中隐藏的功力,却是一些审美上的懒惰者,他们沉迷于玩味这些套路以及套路背后的功力。有的小说家则专注于“打法”,有感即应,随物赋形,根据表达的需要临场发挥,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创造。这类小说家可谓勇猛精进,充满活力。而成为他的读者同样也要充满活力,不断接受审美上的挑战。其他艺术门类亦复如是——毕加索拒绝套路化,所以成为了毕加索;井上有一拒绝套路化,所以成为了井上有一。

■印象

硬派作家马笑泉

□陈集益

在我们中间是不是真的存在硬派作家,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如果借用目前评论界的眼光,是不存在这么个派别的,因为大家已习惯把作家按“某0后”归类,如同超市售货员因为“这都是瓶装液体”,把一瓶烈酒码放在红酒黄酒乃至酱油可乐中间,看上去还挺齐整。好在这个以十进制为单位的分类不是指10年有效期,而且货品的本质并没有被改变,也改变不了。所以我相信,硬派作家可能是存在的。比如马笑泉就是这类作家。他不仅仅在作品的文字表现上是硬朗的,平日子里为人也是讲究风骨的。这就比较难得。

我和马笑泉结识于2008年,那时他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班,在一个饭局上我们相互介绍,然后我见他没喝几杯就趴在桌上睡着了。这与我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得来的彪悍印象有些出入:他曾与谢宗玉、田耳、沈念、于怀岸一同入选“文学湘军五少将”,“少将”这英武的称谓很容易被人仰慕;而他之前发表的《愤怒青年》《江湖传说》《打铁打铁》等小说,不论是小说标题还是人物形象都让人联想到黑社会老大;作者怎么这么斯文,不胜酒力呢?直到2015年鲁院举办第二十八届高研班(深造班),我们成了同班同学。通过交往,我发现马笑泉是一个文如其人或者说人文合一的作家。

首先在创作上,前面已经提到,他的文字风格是有硬度的。尤其早期作品,下笔狠,节奏快,情绪克制,如一记短拳,不是朝着我们脆弱的鼻梁挥打过来,而是拳心朝上,对着我们的肋骨与下腹交接部位,砰砰砰,打得又密集又隐蔽,我们忍受着拳头的冲击力,感受着作者出拳的酣畅淋漓,但是被打趴下却不见血。这是马笑泉作品的一个特点,虽然有着暴力的一面,但不会满面流血。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一代作家都被余华的《一九八六》《现实一种》震慑过,那是极其刺激,的阅读体验,但是那感觉探究起来有点像看街头打架或者刑场看枪毙,我们是其中的看客。这主要在于余华小说的指射与我们的记忆构成不在同一时间段,而且那些暴力描写多少带有表演性。但是当时时间推移到马

笑泉这里,所谓的暴力已经化解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它的源动力不仅来自“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的关系”,更多的是源自青春荷尔蒙的作用。我们差不多是看着《少林寺》《上海滩》《古惑仔》及其他武侠小说或黑帮影视作品长大的,我们崇拜盖世武功,年轻人以练过几年武术或者模仿港片黑帮的派头为荣。所以,当暴力叙事与青春躁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种生命中雄浑的、原初的力量就萌生了,这就使得他的小说摒除了刻意的雕琢,有一种天然的硬朗。

其次,马笑泉在小说创作的态度上,也体现了“硬”的一面。从选材、语言、细节、人物、构思,均力求章法严谨,逻辑周密,结构新颖。其“愤怒青年”系列小说,有的篇什采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有的采用零度叙述,有的则打破现实和传奇的界限,或者采用多声部叙述。《银行档案》在文体上首创“档案体”小说,是继韩少功的“词典体”后小说形式探索的进一步。最近完成的《迷城》则用穿插式的叙述,回忆与在场兼行。这些小说除了文体方面的努力,在内容上更是体现了“硬碰硬”的精神。马笑泉是一个敢于直面当下处境、追求“内心与时代共振”的作家。对此,评论家贺绍俊有评价:“在作家圈里存在着一种政治恐惧症和政治淡漠症,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作家中表现更普遍……难得的是,马笑泉对政治却充满了热情,他乐于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世俗人生。那些患政治恐惧症和政治淡漠症的作家其实是对政治作了狭窄的理解,以为政治就是说权力场上的事情。政治自然离不开权力,但远比权力要复杂得多……《迷城》让我看到了一位成熟和沉稳的思想者和审美者。”——再看眼下,有多少作家业已陷入琐碎的、平庸的、小我的叙述里无力自拔。这倒不是说作家必须要去书写“时代”“人民”什么的,而是说他的内心是不是具有更大的情怀,来笼罩他所书写的那些日常的、细碎的故事。相比之下,我喜欢视野开阔、悲天悯人和具有精神向度的小说。

另外,阅读马笑泉的小说会发现,他的小说几乎没有虎头蛇尾的疲软现象。这也是我喜欢他的中、长篇小说胜过他的短篇小说

的原因。当然,这个结论不是通读他的作品之后得出来的,多少有我的一厢情愿在里面——事实上,他新近发表的《轻功考》《宗师的死亡方式》等短篇我也喜欢——而是觉得,凭他下笔时充沛的元气,雄壮的气势,其实更适合搞中、长篇小说。他的文笔带有一种“透着荡气回肠的阳刚之美”(陈建功语),而且他又有让这力量持续到小说结束的耐心与定力。他本人曾坦言:“创作者也可以借助叙述技巧绕着走,比如说:留白。不过,有的留白是真留白,比如汪曾祺的小说留白,有的所谓留白实质上是回避叙事难度。但以我的经验,只要在关键节点回避一次,整部小说就会无可避免地弱下来。所以每当遇到叙述障碍,暂时攻不破,我宁愿停下不写也不愿绕过去。”看到这段文字时,我仿佛又看到马笑泉坐在鲁院大会议室里,一排评论家的对面,他作为学员代表之一就先锋文学遗产与评论家展开研讨时不卑不亢的样子。“我辈作家很快越过‘长兄’(指先锋作家),找到了‘父亲’,即西方自卡夫卡以来所开辟的现代派文学,并从他们那里领会到真谛:先锋首先意味着一种自由探索的精神……”

我已经记不全鲁院老师为我们组织了多少次类似的研讨及思想的碰撞。班上的李浩、弋舟、黄孝阳、王十月、马笑泉、于晓威、东君等等,每次发言都很精彩,其中马笑泉的口才和思辨力有点出乎意外。因为我根据不知从哪儿得来的经验,觉得形象稳重有如拳师或者镖局掌门人的他,应该是敏于行而钝于言的,没想到他的发挥即便不能说班上第一,至少也能得第二。总之我与他在课下的交流多起来,渐渐发现我们的很多文学观点近似,比如对小说虚与实的看法,对如何在现实主义框架下创新的认识,对写黑写暗写残酷的再反思,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都有点惺惺惜惺惺的意思吧,虽然他的作品比他少,但是好在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往不时兴把文学成就和作品目录贴在额头上,就像印第安人的酋长那般装扮——而是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沟通与互补,所以,我自认为他也是读懂了我的人。

马笑泉小说创作的三个维度

□张艳梅

小说读得越多,期望值越高,但是能够让人眼前一亮手不释卷的越来越少,马笑泉的小说这是少数之一,他是能够不断给读者带来惊喜的作家。他的小说,不仅风格鲜明,有着丰富的想象、创造和阐释空间,而且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先锋性与可读性兼备。马笑泉是一位全能型写作者,在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等领域,都创作出了大量优秀作品,语言韵味独特,对地域文化有着自觉的归属感,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不乏独到发现。他性情温厚热忱,反思历史、观察现实却目光冷峻,颇具思想锋芒。

江湖·民间·庙堂

文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在文学中可以获得感性认知。《愤怒青年》中,我们不难读出港台武侠小说的江湖义气,黑帮片的快意恩仇。1990年代初期刚好是武侠文化和黑帮文化流行热潮。黑帮电影是现代工业社会机械体制压力下,人们在精神领域寻求逃避的一个出口。我们在楚小龙身上,同样看到了自我追寻、自我实现的一种努力,他无视法律与强权,遵循自己的规则,保护弱者,伸张正义,追求公平,恩怨分明。在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畴里,他和虎头这样的年轻人都是迷途羔羊,而在他们的人生规则里,他们不甘心做沉默的任人宰割的羔羊,才选择以暴力重新厘定生活准则。这些年轻人并不是杀人眨眼的魔鬼,楚小龙对苏丽的爱,对阿红的理解,对兄弟的忠诚,对老师的情义,都是源于他内心的善良和温暖。楚小龙在小县城长大,凭借武力获得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存在感,他杀人抢劫,血腥残忍,但是读者依然对其充满同情,并不是小说模糊了是非观念,而是超越简单对错,给出了个人命运历史性的观照。对照那个黑社会老大王一川,楚小龙想要的其实是一个没有争斗的世外桃源,王一川想在社会生活中复制江湖规则,实际上他的江湖就是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愤怒青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日常经验之外,审美意义之始。今天我们对自身所处的世界仍旧知之有限。天人合一不仅意味着一种世界观,还是一种生命境界,人的精神生活、道德伦理往往同大自然之间有着内在的呼应或者感应。马笑泉曾说起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我敬畏自然,所以有了《巫地传说》。”在主流文化、大众流行文化之外,马笑泉呈现的是一种异质文化,不在于猎奇,而是回归生命,思象生

活和世界的本质。《巫地传说》中沿着民间传说这条主线,写实与虚构相融相生,讲述了故乡的异人轶事,放蛊、落洞、通灵、还愿、鲁班术、梅山术等等,无论是习武的、做木工的、钓鱼的、放鸭子的、打猎的、做师傅的,都有着常人所不及的特异功能。小说并不局限于他们的超人能力,而是在他们的命运起伏中,带出对历史、现实及复杂人性的深刻反思。

马笑泉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人心有很深的理解。这其实并不容易,好多写作者既不清楚自己写作的方向,也不确定自己能够完成什么。马笑泉是少数清醒的写作者之一。与《愤怒青年》的江湖文化,《巫地传说》的边地文化不同,《迷城》展现的是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官场文化。小说以迷城县常委鲁乐山坠楼死亡为叙事节点,向前向后两条线有条不紊交替并行:一是鲁乐山死后发生的故事,后事处理及由此引发的矛盾。二是回溯杜华章到迷城任职,与鲁龙山相识、交往、合作,发展迷城旅游业,发掘保护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这是一座充满了迷宫意象的县城,官场上生生死死,升迁落马,往往都是一瞬间的事。杜华章和鲁乐山,一柔一刚,一圆融一方正,分管的工作相近,工作上是很好的搭档,生活中是谈得来的朋友。鲁乐山喜欢事必躬亲,杜华章遵循事少而功多,一偏儒家,一向道家。有所作为,无所作为,胡作非为,是为官者的三种状态。小说中,鲁乐山的生死变故,杜华章的仕途生涯,都是在官场生态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小说充分展示了基层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态。

历史·群体·个人

每一代作家都会对历史做出自己的评价。“70后”作家的历史意识越来越鲜明。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创伤在个人身上,会以怎样的方式不断地表现出来,这些创伤记忆具有怎样的普遍意义?我们反复书写历史悲剧,无非是希望不再重蹈覆辙。《愤怒青年》中,楚小龙的父母被出卖,被迫害致死,在那个年代,是最普遍的故事,那么多家破人亡的惨剧,楚小龙并不是最不幸的。而出卖者在制造了悲剧之后,依然能够逍遥法外。当年的杀人犯还是高高在上的正人君子,而受害者走投无路成了杀人犯。楚小龙和虎头这样的年轻人,手无寸铁,他们有的不过是一腔热血。这就是小说中的愤怒所在吧。马笑泉认为,“优秀的小说在叙事表层下起码有一个文化结构在支撑,比文化结构更深层的是精神结

构。”历史是最大的谜底,也是最大的谜题。马笑泉从不同视角讲述了愤怒青年们的人生遭际,宏观的历史浓缩在微观的命运里,现实与理想,妥协与反抗,残忍与温情,出卖与践踏,真实与荒谬,纠结在一起,悲凉孤愤贯穿小说始终,小说在江湖恩怨背后,充满了历史意味和隐喻色彩。

与《愤怒青年》中特殊历史年代作为楚小龙人生悲剧的背景不同,《巫地传说》不再写到了知青受到非人迫害,知识分子惨遭蹂躏;还写到了善良民众的出卖告密,栽赃陷害,在个人利益面前,每个人都把人性最恶劣最黑暗的那一面展现出来。生活的意义在于我们的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是一种意义的生成。沉重的历史依旧是今天的枷锁,所谓活着的尊严,只不过是回到人性的基本立场。杨红秀和霍铁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也是不愿与那个时代共谋的清醒者,他们不甘心被异化,不甘心与众人一起堕入黑暗的深渊。落洞和自杀,看起来是逃避乱世,清者自清,悲剧背后,是历史之墙上不肯紧闭的双眼。

《迷城》中,多处讨论到历史话题。杜华章到迷城任职后,力主穿城河清淤,并且在河岸边修了栏杆,做了文字记载。雷凯歌认为汉白玉栏杆增加了历史感,与迷城这座古城很般配,杜华章认为簇新的汉白玉和石狮子,与河上历尽沧桑的古桥并不协调。杜华章关于修整河道的感慨,也很有意思,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关于治水的记录,以及民众熟悉的比喻。清淤清理出很多陶瓷碎片,杜华章认为这是历史的见证,虽然不能复原,触摸观赏之际,也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光亮和色彩。那么,我们面对的历史长河,究竟是淤泥沉积,还是残破碎片,抑或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不过是华而不实的装饰?

现实·人生·命运

“70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人写过成长小说,讲述乡村、小镇、小城市青年的成长历程。小说主人公多半是生活的边缘人,在青春的迷惘中寻找方向,经历与父辈的冲突,懵懂的爱情,叛逆、出走、迷失、受伤和回归。马笑泉自述:“我创作《愤怒青年》时23岁,整个人处于一种郁闷状态中,作品所呈现的共振关系就是抗争。”小说中的青春是残酷的,那种破坏式的抗争,标记着仇恨、鲜血和死亡。楚小龙自小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靠捡破烂度日,16岁那年冬天,他从学校回到家,书包底破了,所有书都散落在地上,而床上久病的奶奶已经死去。寒冷、贫穷、孤苦无助、僵

硬的奶奶、破碎的书包这就是小说的开始,也是楚小龙走上黑社会道路的开始。小说以回溯性叙事拉开了楚小龙短暂而暴烈的人生帷幕。楚小龙从劫掠开始,遇见虎头,加入帮派,替人收账,帮人寻仇,争夺地盘,逞强斗狠,依靠武力在社会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在生死边缘谋生。表面上看是快意恩仇,江湖侠义,其实时刻都面临警察抓捕和死亡威胁。对于楚小龙和虎头来说,人生并不是没有别的可能,是因为生命里熊熊燃烧的怒火,让他们走上了一去不回头的反叛之路,最终把生命燃成灰烬。马笑泉并没有沿着成长小说的惯性,让这些年轻人经历挫折,不断反省,获得成长;而是从一开始就给出了悲剧结局,然后不断回溯悲剧的成因。

近年来,梁鸿、李娟、黄灯等“70后”女作家的乡土非虚构作品备受关注。这几位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情理兼具,观照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遭遇的艰难困境,从制度建设,到人的文化心理、精神信仰等面对的各种问题。“70后”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童年少年时代是在乡村度过的,如今人近中年,身在都市,心却常常挂念故乡老家。无论是李云雷浪漫温情的乡村回忆录,还是朱山坡的乡土中国隐喻,或是刘玉栋的现实主义表达,社会转型期乡村变迁以及人的分化裂变,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和见证。作为同年代人,马笑泉的目光、思想和笔墨,始终关注贫穷、闭塞、荒芜的乡村。《巫地传说》在历史和传说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维度,那就是现实关注,这一点同样能够体现出马笑泉的人文情怀。近距离的社会问题聚焦,镜头对准老家发展。铜顺爹在与开发商的冲突中不幸身亡,铜发爹为了保护家园不被破坏,也为了铜顺爹不会白白死掉,怒砍开发商,最后自己死在看守所。小说写到年轻人纷纷逃离家园去南方淘金,而在城市中疲于奔命的异乡人,满怀乡愁,偶尔有喘口气的机会,故乡古朴宁静的生活就像黑白电影一样放映。小说探讨了发展的路径选择,乡村发展不是招商引资资源开采一条路,资源总有开采完光之时,如何才能够不破坏青山绿水,不破坏世道人心,拥有长治久安的生活。小说写到了乡土人生的变迁,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婚恋、都发生了变化,法术也不那么灵验了。旧有的一

切都在慢慢变得遥远,成为一种记忆。

如果说《愤怒青年》有着深层隐喻意味,《巫地传说》展示了神秘主义力量及奇幻色彩,《迷城》则从叙事艺术、文化意蕴、审美表现及思想内涵上,都更加丰富立体。杜华章、鲁乐山和梁静云父女长于书法,精于茶道,对传统典籍领悟通透,《迷城》虽以官场作为故事背景推进,却是政治、文化和情感三线并行,而在杜华章身上获得统一。为官之道,做人境界,都与书法艺术浑然一体。泼墨挥毫,不仅是寄托、释放、纾解、言志、传情,而且是文人雅士一种内在的文化认同。如果说鲁乐山有着侠义之风,杜华章身上则有着浓厚的文人气息,读到他的困顿、隐忧和义愤时,难免想起程秋白《多余的话》。政治斗争有时候不仅残酷,还可能是卑劣的。这往往是文人官员更难以忍受的,遑论对艺术的摧残,对伦理道德的践踏。杜华章面对的挑战很多,来自个人情爱、亲人威胁、底层民众、上层领导,还有自己内心的质疑。政绩、良知和情趣、纠结在一起,人生是一张网,杜华章算不上游刃有余,只不过因为他的圆融和智慧,才得以在刀光剑影中一路向前,可惜情与理终究不能两全。杜华章和鲁乐山的书法造诣深厚,梁父更是书法及收藏大家。卤菜虽来源于民间,美食节之前,未登上大雅之堂,但是在何氏父子身上,同样古风犹存。从楚小龙、铜耀爹、铜发爹、杜华章、鲁乐山等人物形象塑造中,我们不难发现,马笑泉欣赏满腔热血、侠肝义胆、才情出众、文治武功的理想人格。虽然在过去某个时期的官场上,这样的人注定很难与环境相容。所以,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体恤民众,直而不公,谋求正义的鲁乐山最终死于非命。对于杜华章来说,静云轩茶馆就是世外桃源,是心灵栖息之所,是与天道人性相通之地。而杜华章的茶馆情结,与楚小龙对南方的追忆、霍勇对故乡的怀念,同样是具有超越性的乌托邦理想。

马笑泉是一位特别富有创造力和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的小说有种神秘感,暴烈时令人魂飞魄散,温情时充满浪漫诗意,讲故事娓娓道来,写人心入木三分。无论是日常性,还是隐喻性,无论是现实主义、神秘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在马笑泉小说中都是路径,最终抵达的,是他的社会理想和理想文学。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